

臺博館附近有形文化資產之再考證（一）： 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

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臺博本館週邊、二二八公園內公園內的各種建造物或建造物殘蹟之系列研究的第一年計畫，經由歷史文獻考證、現地調查等研究工具，釐清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的拆遷過程與其脈絡，並討論最終座落於公園內的現代性意涵。

臺北市定古蹟黃氏節孝坊，經考證後確認曾歷經 5 次拆除、3 次重組，建坊之時為晚清臺北城內政治教化的設施，其拆除遷建過程與日本時代發布臺北市區計畫與執行市區改正有關。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拆遷演變的脈絡與內容，對應了臺北從城牆都市到現代都會的現代化進程，若都市的機能性需求大於政治教化的考量時，即使是被官方認定具有政治教化效益且不宜毀棄的建造物或文物，無法於現址留存時，便有可能被遷移到同樣具有政治教化機能的公園內易地安置。

關鍵詞：節孝坊、節孝祠、新公園、市區計畫、古蹟

前 言

臺博本館的所在地「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簡稱二二八公園），原名臺北公園、臺北新公園等，為二十世紀初期市區計畫下所建置的都市公園，自落成以來一直被視為首都臺北的名勝地之一，1900年8月於市區計畫公告劃定為公園用地，1906年草創、1911年園區向北擴充，後續官方逐步新增設施、局部改造或調整等等，不同時代的建設與破壞，在公園內留下各種痕跡或殘存的建造物，成為不同時代的見證。這些殘存的建造物中，不乏具有文化資產價值者，亦有已經指定或登錄為法定文化資產者，例如黃氏節孝坊、急公好義坊、杏壇（原柳生一義銅像）、博物館、銅牛、機關車、音樂台、土地公廟、二二八紀念碑、後藤新平銅像殘跡、臺灣護國神社神馬、日晷、噴水池、心形池、原放送局放送亭、原臺北放送局、亭台樓閣等等，這些建造物或文物的建置或移入公園的過程，反映了近代城市居民休閒娛樂、防災避難、舒緩身心等城市生活的需求，更呈現了近代臺北第一個都市公園其強烈的政治性格與紀念意義。

這些被建置、被移入或被改造的建造物或文物，其建造、修繕、增建、改造或拆毀等等過程，在二二八公園相關研究中有所描述，¹常見於尋幽訪古、旅遊札記等報導隨筆，更不斷被轉載、沿用或改寫，流傳散播於網際網路中。然而原先並非坐落於公園內，卻因某些理由被移入公園陳列展示者，其建置背景、被迫遷離原址的理由與過程、遷入公園的理由與過程、在遷建過程中其面貌有何變化等等，仍有諸多模糊混淆以致產生歷史錯像之處。

二二八公園的建置與經營，是臺北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特徵，回顧並釐清這些建造物出現在公園內的過程與其脈絡，等同於再檢視原為傳統城牆都市的臺北府城轉變為現代都會臺北市的現代化過程與其反映的現代性，本研究以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臺博本館）所在地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外為空間範圍，以臺北舊城建設工程起始之光緒8年（1882，壬午年）迄今為時間範圍，以曾出現於公園內且現存殘跡遺構的建造物為調查研究對象，屬有形文化資產之歷史研究，為跨年度、延續型、系統性的研究計畫。

本年度自行研究計畫之調查研究對象為坐落於臺博館東北側園內道路上的「黃氏節孝坊」，及與節孝坊相關但現今已不存的「節孝祠」。經由文獻考察，以臺灣總督府檔案及《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史料，輔以各時期實測地形圖、地籍圖、市區計畫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資，配合在二二八公園及圓山公園的現地踏查等，本研究企圖釐清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的建置背景、原坐落地點、拆除與重組或重建過程，調查其原貌與現今面

¹ 如宋曉雯，2003〈日治時期圓山公園與臺北公園之創建過程及其特徵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蔡思薇，2006〈日本時代臺北新公園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等。

貌的差異，檢討其文化資產上的價值，與在臺北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呈現的意義。

一、文獻史料所見的黃氏節孝坊遷建過程與其混淆之處

黃氏節孝坊為臺北市定古蹟²，歷經多次搬遷後才落腳於現址，有關黃氏的生平、建坊的過程、遷移的原因與經過等描述，在文獻史料及網路文章中多有提及，彙整如下：

- 一、建坊理由：為旌表艋舺王家霖妻黃氏諱名跽娘的節孝事蹟而立。³
- 二、生平事蹟：黃氏為艋舺人，生於清嘉慶 25 年（1820），卒於光緒 19 年（1893）享年 74 歲。黃氏 16 歲時嫁王家霖，28 歲喪夫；46 年間上事翁姑、下撫遺孤，清操勁節，鄉里賢之。
- 三、建坊過程：黃氏的節孝事蹟在同治年間奉旨旌表，光緒 8 年（1882）年建坊，並由進士陳季芳等題聯刻石，用示範垂貽教後世。⁴
- 四、牌坊遷建：節孝坊原立於府城東門內，日人據臺後，一說為興建總督府官舍，一說為拓建總督府官邸圍牆⁵，另有一說為興建總督府秘書官邸⁶，而於明治 34 年（1901）辦理遷移，移築至新公園內。

民國 79 年（1990）因臺北市規劃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黃氏節孝坊正處於淡水新店線新公園站的車站及工作坑上，因而拆除，原物暫存於臺北孔廟後側屋棚內，俟捷運系統完工後，再行遷回重新組立。⁷民國 86 年（1997）移回二二八公園內、省立博物館東北側重組，是年 10 月 30 日竣工。⁸

上述項次一至三有關建立節孝坊之緣由與其過程，各方說法趨向一致，但項次四有關牌坊之遷建，則有較多的歧異及不明之處。

有關拆遷行為是自願或受迫？一般認為節孝坊從東門內原址拆遷是被迫的，並非自主拆除，拆除原因至少有三種說法，但都指向臺灣總督府的官邸或官舍（總督官邸圍牆、總督府官舍、秘書官官邸等）之營建行為。有關拆遷的次數，普遍說法為兩度拆遷：第一次為 1901 年從東門內拆遷到新公園內、第二次為 1990 年因捷運台大醫院站新建再搬

² 1985年8月19日內政部以（七四）台內民字第338095號指定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後因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改指定為臺北市定古蹟。

³ 《國家文化資產網》，<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19850819000009>。

⁴ 同註3。

⁵ 2007/8/18 〈黃氏節孝坊〉，《記憶·臺北》部落格，<https://blog.xuite.net/liangcw/blog/12148910>。

⁶ 1906/2/7 〈節孝祠之碑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4版。

⁷ 羅玉蓓，1990/3/8〈古蹟搬家 小心翼翼 黃氏節孝坊拆了解體後全部碑體暫存孔廟〉，《聯合報》。

⁸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8 《臺北黃氏節孝坊組立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臺北：臺北市政府，頁50-51。

遷到新公園內現址，然而從各種資料顯示，在二十世紀初期節孝坊被拆遷的次數、拆除時間、重組時間及地點等，其過程仍有諸多混淆之處，例如：節孝坊與節孝祠的關係為何？兩者興建時間的先後關係為何？其次，牌坊自原址被拆除的時間仍不明確，拆除之後立即重組，抑或零組件曾暫存某處？再者指 1901 年為牌坊遷入新公園的時間，然而依據當時臺北市區計畫的公園範圍僅有南側、面積不及今日的一半，若年代正確，則第一次重組之地點必不在今日公園東北側而在南側某處，換言之東北側為第二次重組，相對地若東北側為第一次重組地點，則重組於 1901 年的說法為錯誤。

二、節孝坊及節孝祠從建造到拆遷之背景與過程

本節企圖釐清黃氏節孝坊及節孝祠從建造、拆遷、重組或重建等過程中前述諸多混淆不清之處，並企圖解析其拆遷重建的脈絡與都市發展的關聯。以往文獻史料中，大多以「旌表」一詞指稱各類表彰人士成就之而由官方准設之牌坊，亦有使用「石坊」一詞描述其材質與形式，此 2 者為本研究耙梳文獻史料之關鍵詞。

（一）節孝坊及節孝祠的建造經過

黃氏「天旌節孝」旌表建於光緒 8 年（1882）殆無疑義，建坊之時，表彰之對象王府黃氏仍健在，當時臺北城牆正興建中，東門也尚未完工。城內西側的西門街與石坊街口，另有一座牌坊「急公好義」為表彰富商洪騰雲捐地建考棚而設，兩座石坊一西一東，分別座落於西門內與東門內。

有關黃氏節孝坊的建置背景的記載，大多引自明治 41 年（1908）《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一則為王純卿祝壽而撰擬的小傳〈王純卿氏之齒錄〉⁹：

庚午歲。淡水廳陳公培桂。採訪其母黃孺人節孝。為稟明大憲。列入廳志。工部主事高公臚璟。為奏請於朝。奉旨旌表節孝。賜金三十兩建坊。並賜建造節孝祠崇祀。春秋祭典。壬午歲。老人赴泉郡購取石材。督工製造。轉運來臺。欲以建坊……壬午年。坊建於東門內。數月落成。官吏紳商拜坊者數百人。極形熱鬧。開費計二千餘金…

清同治 9 年（1870，庚午年）淡水同知陳培桂主編淡水廳志時曾採訪王母黃氏的節孝事蹟，同廳工部主事高臚璟奏報朝廷黃氏節孝事蹟並求旌表，經同治皇帝下旨准建坊

⁹ 1908/1/1 〈王純卿氏之齒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3版。

及節孝祠，並賜金三十兩。光緒 8 年（1882 年）黃氏之子王純卿前往泉州選購建坊用黑白石材，並督工製造，石材組件轉運來臺後，歷經數月組構而成，其坊興建在臺北府城的東門內，落成之際有數百名官吏紳商出席，建坊共耗資 2 千餘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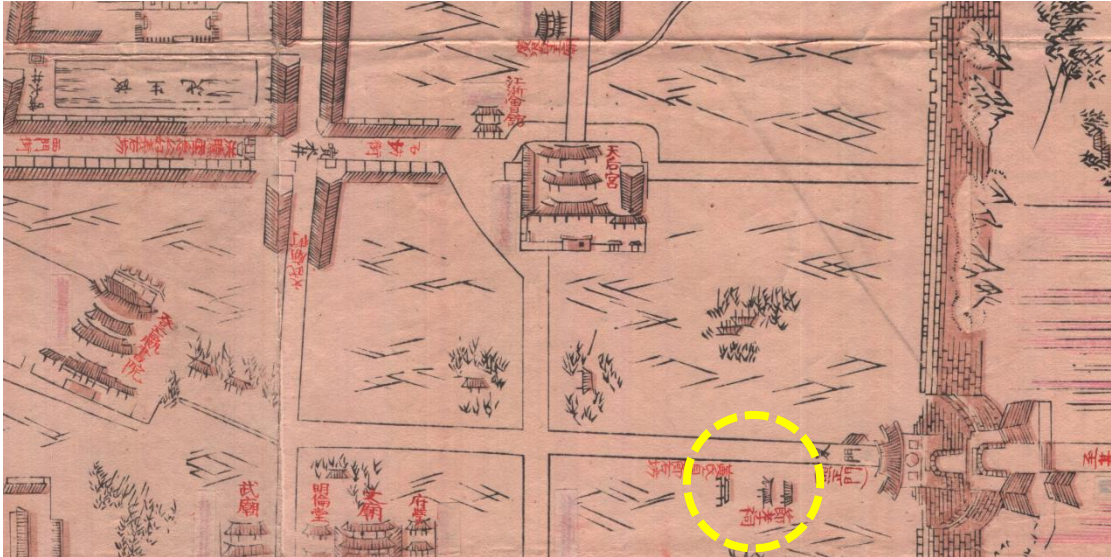


圖 1. 《臺灣臺北城之圖》節孝坊與節孝祠之位置（1895 年）

說明：黃圈處為節孝坊（註記為：黃氏貞節石坊）及節孝祠位置。原件為木版印刷，淡彩繪圖，圖上緣為南、無指北圖示，本圖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之同圖（識別碼 2009.011.0461）比較，圖上有伊能嘉矩以朱筆標註之文字。本圖取其局部，旋轉 180 度以便對照。
來源：不著撰人，1895，無比例，局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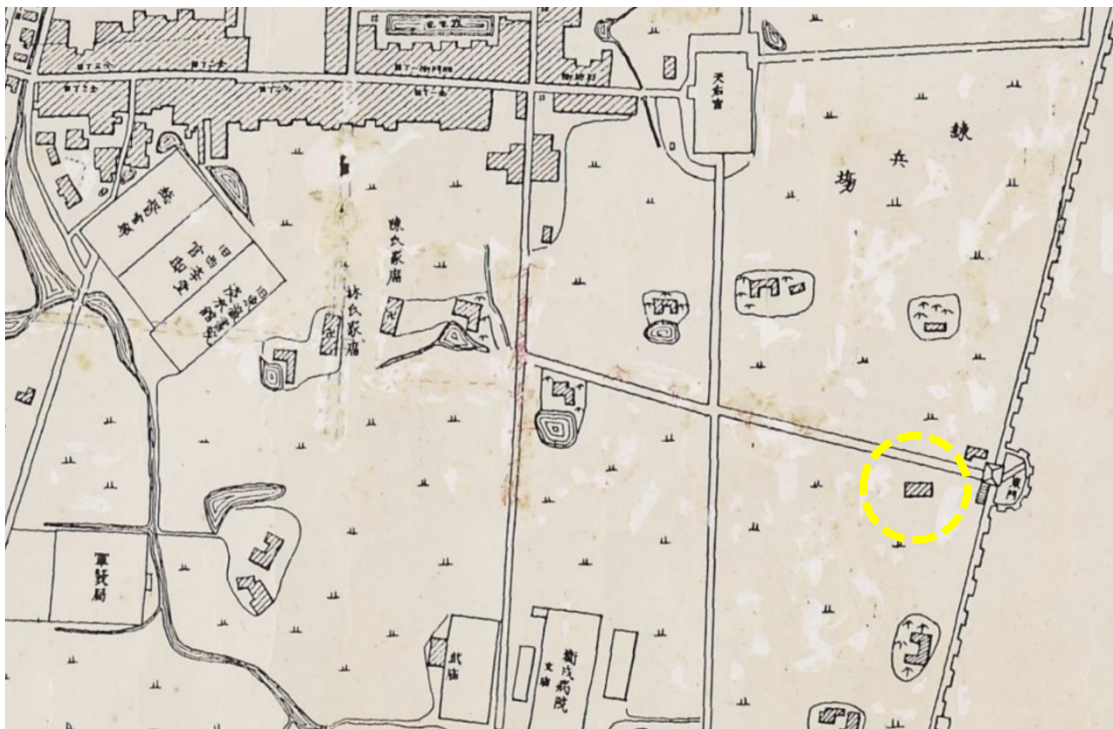


圖 2. 《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節孝祠之位置（1895 年）

來源：臺灣總督府製圖部，1895/12/13 出版，1/4,000，1895/8/10 測圖，局部。

依一般建置牌坊的慣例，牌坊多設於道路中央，人車自牌坊下穿越通行，急公好義坊即是如此，但黃氏節孝坊原始位置雖在城內，卻未設於東門街（即今日凱達格蘭大道南側）上，而在東門街南側，為東西向，原址約在今日外交部正門一帶（參見【圖 1】）。

節孝坊建置 12 年後，王家又在節孝坊南側自力建造了一座節孝祠。推測建祠的原因，可能是黃氏在光緒 19 年（1893）仙逝後，王家為了祭祀主母得以永饗後世香燈，更能彰其節操而永世流芳，遂斥資建祠，期能與 1882 年的節孝石坊相互輝映。

有關節孝祠的新建時程，據臺灣日日新報前期〈論議〉專欄主筆「梯雲樓主」於〈臺北節孝祠重建議〉文內指出，節孝祠係由王姓等殷實富人倡建於東門街（其位置見【圖 2】），但在日本帝國領臺之時仍未完竣，因而也未有招人進主祭祀。¹⁰1906 年節孝祠重建時，王純卿所撰之「臺北節孝祠碑記」亦提到：節孝祠創建時，除王純卿之外，亦有大龍峒王慶壽、王慶忠，及杜廷勳等人捐資，蘇義吉獻地，但直到光緒 21 年（1895）臺灣割日時，東門街的節孝祠尚未啟用。

憶舊政府時。予與王君慶壽慶忠。杜君廷勳等。因紳民建設之例。稟請於官。捐資擇建於臺北城東門內其地為鄉人蘇義吉所獻。迨經營甫畢。適逢割臺。塵氛未靖。立碑之事缺如。而祠亦遂為屯所。¹¹

該碑記也提到日本治臺初期節孝祠建物曾被日軍徵用一事，明治 31 年（1898）3 月至 7 月間，臺灣總督府進行「兵營及其他使用之社寺廟宇調查」¹²，要求各地方縣廳清查充當兵營或政府機關使用之社寺廟宇並回報，其時臺北縣管內有 31 處廟宇被日軍或官廳佔用，其中也包括城內東門邊街的節孝祠，充當陸軍倉庫部臺北出張所的倉庫。

（二）節孝坊因市區計畫而拆除

日本治臺後開始推動臺北市區計畫，將晚清的傳統城牆都市逐漸改造為近代城市，明治 33 年（1900）年 8 月 21 日臺北市區計畫委員長村上義雄向總督兒玉源太郎提出建議，因為臺北市區計畫發布後，石防街、東門邊街上兩處石坊被視為阻礙交通、道路上的障礙，大可一拆了事，然而石坊是舊政府時代表彰節婦及公共事務上有功者的旌表，乃建議採用遷移方式，將牌坊移築至臺北城內公園預定地上，既可以保存，又能增添公園的風景。¹³

節孝坊因市區計畫而首先遭到拆除，拆除時間雖未見錄於公文檔案或臺灣總督府、

¹⁰ 梯雲樓主，1901/1/27 〈論議：臺北節孝祠重建議〉，《臺灣日日新報》，日刊，5版。

¹¹ 1906/2/7 〈節孝祠之碑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4版。

¹² 「兵營其他ニ使用セル社寺廟宇取調」（1898/4/8），〈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二卷戶籍人事社寺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1012。

¹³ 「臺北城內旌表ヲ公園豫定地内へ移轉ノ件」（1900/8/24），〈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戶籍人事社寺警察監獄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502006。

臺北縣（廳）¹⁴等政府公報內，然據明治 34 年（1901）3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有關節孝坊拆除事件的報導¹⁵，可確定 1901 年 3 月節孝坊已拆離原址，推定這就是目前普遍認為節孝坊於 1901 年遷入新公園一說的來源。節孝坊的拆建工程係由臺北縣當局以 700 圓工費發包給許高陽商會執行，拆除前該商會意圖向王家索取 200 圓的保護費：「可保無工人打壞之虞」，王家認為這是官廳發包的工程，何須用到自己的錢？因此拒不付款，因而遭到懷恨在心的福州籍苦力們「輕舉妄動」將橫架、石座打壞成三段。¹⁶可知牌坊在拆除之際，即有若干零組件遭人為惡意毀損。

石坊拆除後，並非立即於公園預定地上重組。依據王純卿在明治 39 年（1906）4 月 16 日向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之「節孝祠旌表再建請願書」¹⁷內文提到：旌表於拆毀時，其石材已有散落、損毀及缺件的情形，所幸由臺北縣當局代為保管，暫置在臺北縣廳舍（即清代臺北府衙門）面前的空地等。清代臺北府衙門範圍大約在今日重慶南路一段、漢口街一段、館前路、開封街一段的街廓，正門朝西，節孝坊之石材暫置地點大約在今日重慶南路一段彰化商業銀行附近，暫置的時間至少 5 年。

（三）節孝祠拆除後於圓山公園重建

有關黃氏節孝祠從新建、拆除、再易地重建的過程，明治 41 年（1908）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王純卿氏之齒錄〉¹⁸的描述如下：

又慮節孝祠未建。報母之恩猶有缺。於是同王慶壽兄弟。稟請於唐撫景崧。遵紳民自建之例。建於東門城內。開費二千餘金。適逢割臺。遂為屯所。後經發還。仍俾掌理。政府因其地官欲用之。議欲使祠改建於公園。而給發補助金。竝為豎坊於要地。然老人不知也。為祠及坊故。食不甘。寢不安。涕泣如嬰兒焉。斡旋數載。而志不頽。小宮元之助¹⁹君愛敬其孝。代為稟請。得建於圓山公園。

臺灣總督府公文檔案中收錄了明治 33 至 39 年（1900~1906）節孝祠管理人王純卿

¹⁴ 1901年11月因地方制度調整「廢縣置廳」，臺北縣所屬10個辨務署重新分割為基隆、臺北、深坑、桃園、新竹等5廳，臺北廳管轄原臺北、滬尾兩辨務署轄區。

¹⁵ 1901/3/3 〈移坊索詐〉，《臺灣日日新報》，日刊，6版。

¹⁶ 同註15。

¹⁷ 王純卿，「節孝祠旌表再建之儀二請願書」，收於「節孝祠旌表再建願二付決定ノ件」（1906/4/16），〈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甲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9035。

¹⁸ 1908/1/1 〈王純卿氏之齒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3版。

¹⁹ 小宮元之助，日本長崎縣人，慶應2年（1866）1月26日生，明治法律學校畢業，來台初期擔任檢察官，後擔任訴訟代理人，明治34年（1901）曾任訴訟代理人會長，明治35年（1902）擔任臺南辯護士會長，後移居臺北並開業，大正10年（1921）任臺北辯護士會長，曾任靜修女學校顧問，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州會議員等，是當時法律界的大老。引自臺灣新民報社編，1937《臺灣人士鑑》。臺北：編者，頁94。

與臺北縣（明治 34 年 11 月改編臺北廳）當局及臺灣總督府的往返公文書²⁰，讓後世得以對節孝祠從拆遷到重建的過程有較清楚的理解。

如前所述，明治 33 年（1900）8 月發布臺北市區計畫，東門街以南劃為總督府官舍用地，同年 12 月 26 日王純卿向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提出請求書，主張因興建總督府秘書官官舍而願意由政府拆毀節孝祠，但須另擇他處再建，故請求政府發給適當金額的補償金（下附金），²¹臺北縣當局同意從官舍新築費中挪支 700 圓做為該祠的遷建費用。

明治 34 年（1901）12 月 20 日，王純卿將位於東門街 2 丁目、面積 180.885 坪、價值 1,627.965 圓的節孝祠土地，捐給官廳成為官有地，做為總督府秘書官官舍用地。²²這是自清代以降各地方仕紳配合官廳推動公共建設時常見的獻地狀況，將土地捐贈官廳，可以得到美名，亦有可能獲得官方發給拆遷補償費用，若不捐贈而遭官廳收購，有可能賣地所得遠低於市價，更可能因官廳徵收超過土地價值的受益費用，衍生更大的虧損。同一日，王純卿再度向臺北廳提出稟明書²³，主張已核定的 700 圓補償金不足支應以新購土地與重建費用，希望官方能再撥給 800 圓補助款，合計 1,500 圓，並請求在臺北城內公園預定地上重建節孝祠。此案經臺北廳報請臺灣總督府審議，總督府於明治 35 年（1902）3 月 31 日以民總第 277 號通知臺北廳，於當年度公費中再增發 800 圓做為節孝祠的搬遷費（轉移料）。²⁴

關於重建節孝祠的地點，堪稱一波三折，明治 35 年（1902）6 月 16 日臺北廳長菊池末太郎向總督兒玉源太郎陳報節孝祠敷地案，指出原先議定在石坊街公園官有地（即新公園）重建，但祠主王純卿擬於艋舺八甲街（今日桂林路以南的柳州街一帶）民業地上重建，並檢附請求書向官方申請 800 圓加發之補助款。然而因八甲街的預定地被劃入市區計畫道路用地同樣無法使用，²⁵而同年 11 月 6 日臺北廳長向總督府民政長官發出照會²⁶指出：因節孝祠之再建關乎民心，已由官舍的興建費用中支出 700 圓作為遷建費用，現祠主又申請增加經費，雖無預算，但特別以當年度（1902）之公費支應。然而針對移建臺北公園的提議，因臺北公園極為狹小，若將節孝祠移入可能影響公園景觀，並與公園氛圍相異，故不表贊同。

20 「圓山公園地へ節孝祠移築及補助金下付ノ件」（1900/5/5），〈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文書土地家屋社會計教育學術交通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33007。

21 「求請書」（1900/12/26），同註20。

22 「臺北廳王純卿ヨリ秘書官官邸敷地獻納ノ件」（1901/12/20），〈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二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5005。

23 「稟明書」（1901/12/20），同註20。

24 「節孝祠轉移料支給ノ件」（1902/3/31），同註20。

25 「節孝祠旌表再建願ニ付決定ノ件」（1906/4/16），〈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甲〉，《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9035。

26 「節孝祠移轉ニ關シ臺北廳長照會」（1902/11/6），同註20。

因城內新公園、八甲街民地兩處都不能做為重建地點，翌年（1903）6月17日王純卿向兒玉源太郎總督提交「官有地拜借願」²⁷請願書，指出圓山公園環境清幽，為祭祀神靈的適當地點，擬向官廳借用內130坪土地用以重建節孝祠，以表彰節婦孝子的人倫大義。此案經臺北廳長轉呈總督，經總督府各單位詮議後，於10月12日以總督府指令第2302號准許借用圓山公園內官有地100坪為節孝祠再興建的基地，另附帶5點要求出借人王純卿確實遵守，其中有關土地建物的事項包括：許可地點除興建節孝祠外不得他用，但必要的華表及種植樹木等不在此限；官廳若有認為有必要收回土地，將於2個月前通知出借人拆屋還地；節孝祠建物的設計圖向臺北廳提送申請許可等。²⁸

明治37年（1904）3月19日，王純卿檢具「御認可願」（申請書）及節孝祠的平面圖【圖3】、立面圖【圖4】、剖面圖【圖5】，工料明細書等文件，報請兒玉總督核准。²⁹依據設計圖可知，重建的節孝祠為單棟建物，面寬5間1分（30.6尺，約9.27m）進深5間2分7厘（31.6尺，約9.58m）高1丈6尺7寸（16.7尺，約5.06m），面積26.88坪。另據明細書所載之工料狀況，可知建物形貌為傳統漢式祠廟建築，一層平房，木造疊斗式棟架，承重山牆為土塼造，雙倒水兩坡屋面，外覆閩南薄瓦，正面有檐廊，隔扇為四關八扇格柵木門。經費預算方面，木料573.55圓、磚石692.81圓、人工890.2圓，總計2,156.56圓。

節孝祠最終落腳圓山公園內並得以鳩工興建，於明治39年（1906）2月7日（舊曆正月十四）重建落成啟用，總督兒玉源太郎曾賜匾紀念³⁰。重建的節孝祠座落何處？王惠君在《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書中曾指出：「…後來節孝祠被指定建在圓山公園西北角山坡的基地，在起伏的地形和樹木之間，與公園的自然氣氛中的確比較和諧。」³¹，惟「西北角山坡地」的說法並不精確，無法確認其座落地點。在大正3年（1914）臺灣日日新報社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的紀念碑「筆塚」建設申請文件³²中，所附的1/600「圓山公園地圖」等高線圖【圖6】中繪出了節孝祠的位置，在海拔高度約為100尺（33.3m）的山頂平台上，建物平面略呈正方形，面朝東北東約65度方位角。經現地踏查並比對各版地形圖、空照圖後，已確認節孝祠原址在圓山公園內高度僅次於圓山（標高36m）的第二座山丘頂端，座標N25.074058/E121.522217，今稱「親子景園」之處

27 「官有地拜借願」（1903/6/17），同註20。

28 「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付願節孝祠再建ノ為圓山公園地内使用ノ建許可候條左記ノ事項遵守スヘシ」（1903/10/12），同註20。

29 「御認可願」（1904/3/19），同註17。

30 據「臺北節孝祠碑記」，來源同註11。

31 「圓山公園」，引自王惠君，2019《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臺北：左岸文化，頁160-170。

32 「紀念碑建設許可（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1/1），〈大正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25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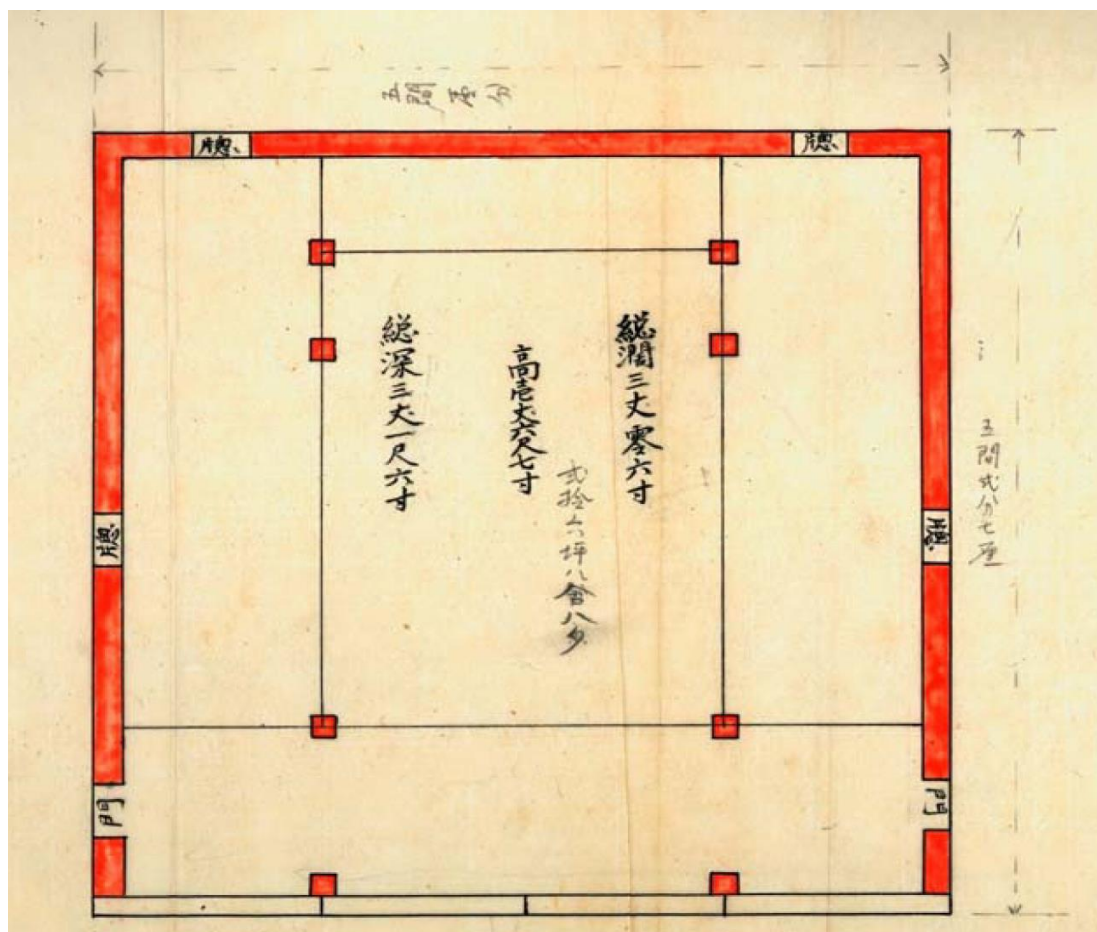


圖 3. 節孝祠重建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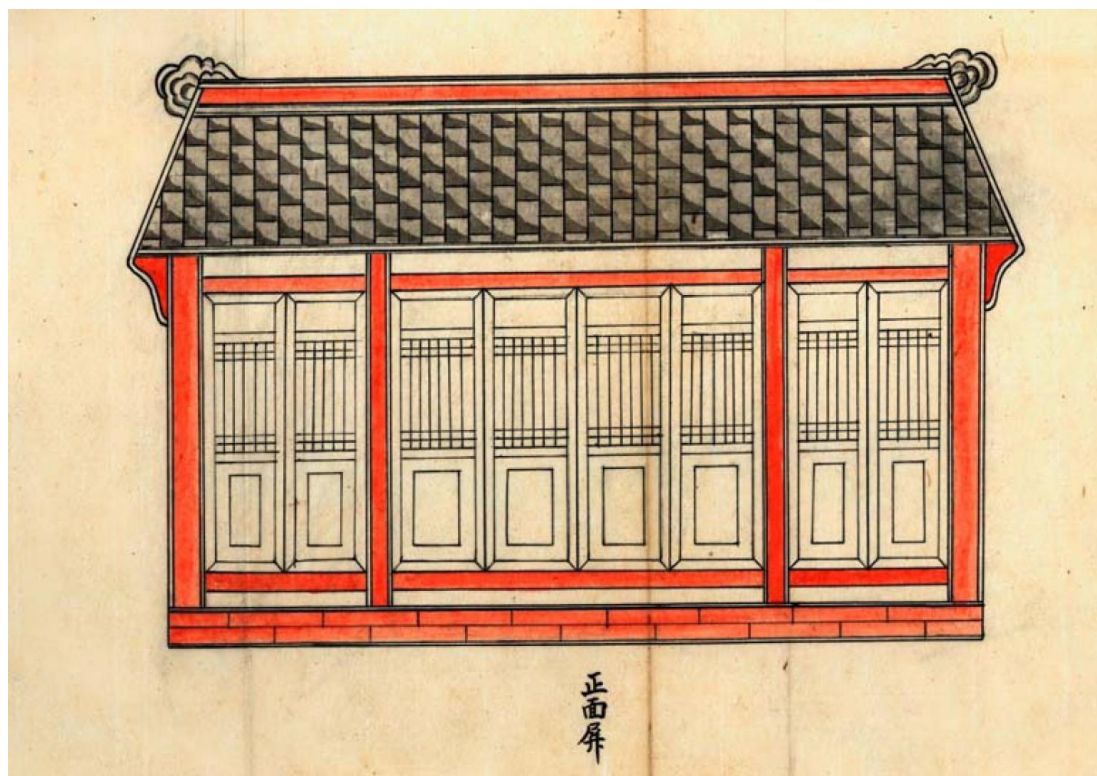


圖 4. 節孝祠重建正立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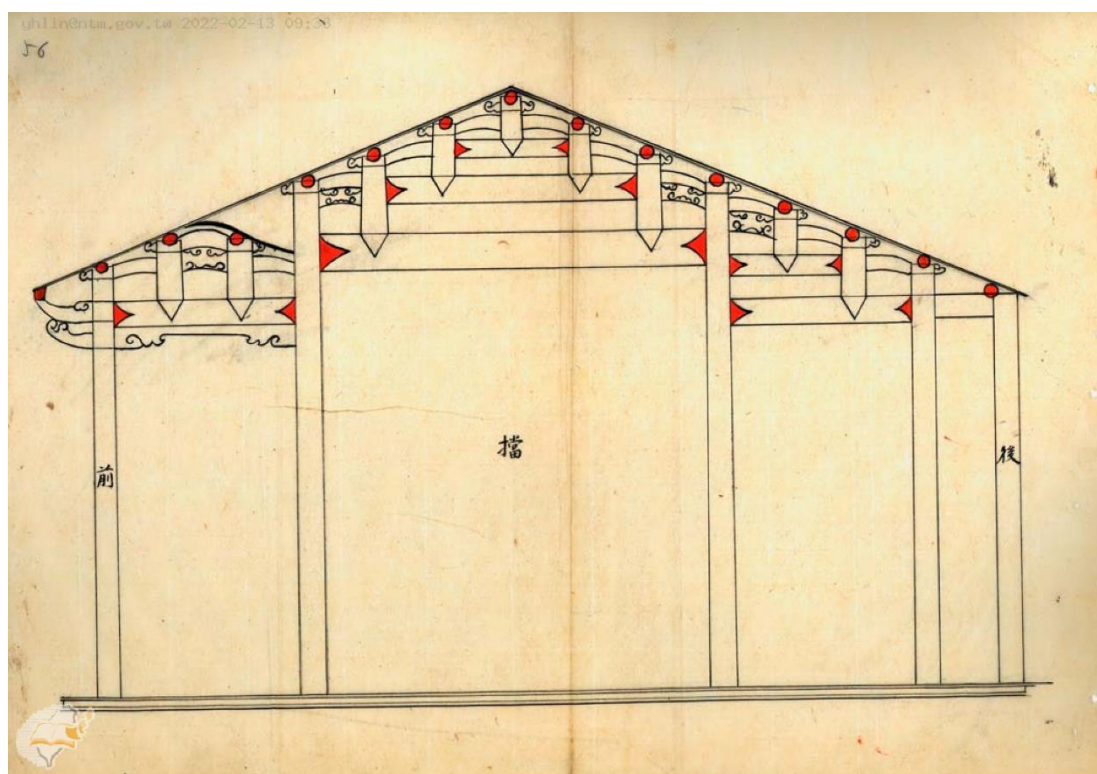


圖 5. 節孝祠重建剖面圖

圖 3 至圖 5 來源：「圓山公園地へ節孝祠移築及補助金下付ノ件」（1900/5/5），〈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文書土地家屋社寺會計教育學術交通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33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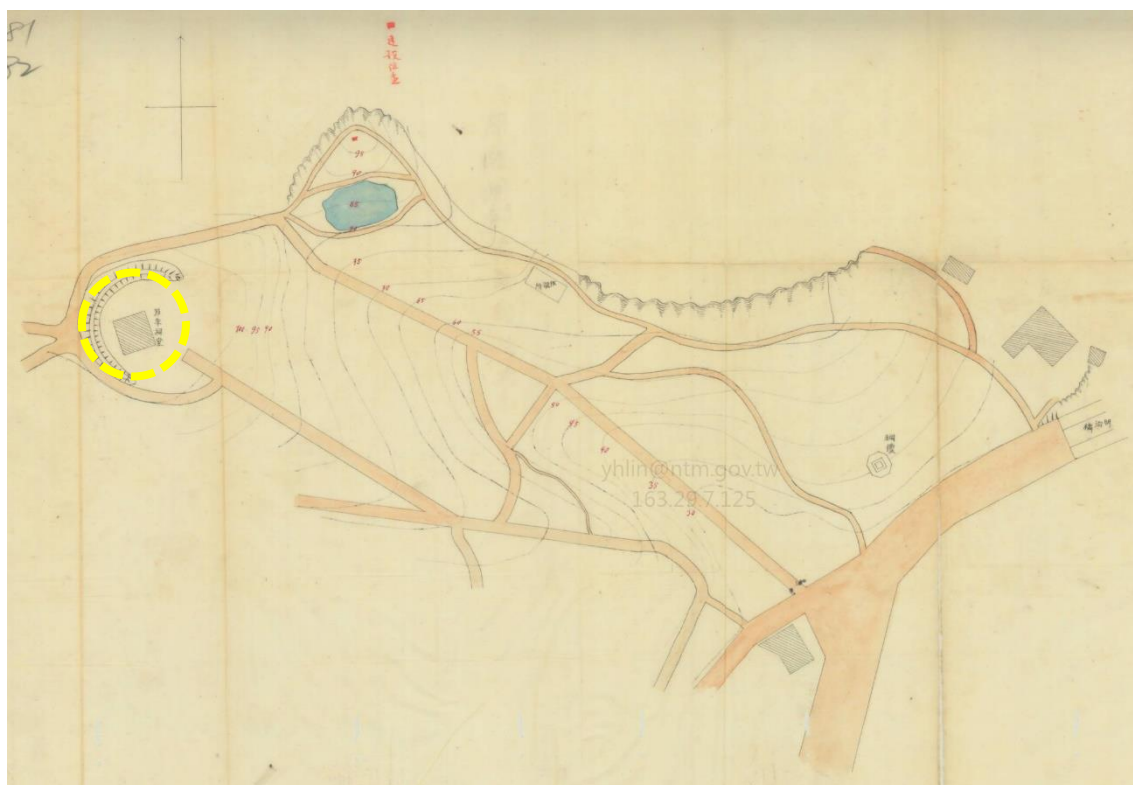


圖 6. 〈圓山公園地圖〉節孝祠之位置（1914 年）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2520079002002M。

經現場踏查，確認當地已無圓山節孝祠建物或其敷地之殘跡，然而該祠是於何時消失？是自然頹圮、拆祠還地或是另遷他處？其下落並未見諸任何文獻史料。推測圓山節孝祠的消失，可能與小眾祭祀圈、官有土地另有用途有關。

節孝祠重建落成後，每年舉辦春秋二祭，與祭者大多為艋舺王純卿與大龍峒王慶忠等家族成員，常見諸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最後一則有關節孝祠祭典的報導在昭和 3 年（1928）年 5 月 22 日³³，其後即無節孝祠的相關報導。本祠重建的關鍵人物王純卿卒於大正 10 年（1921）年 2 月 23 日，享年 77 歲；³⁴大龍峒名人王慶忠（1856 年生）則於大正 14 年（1925）3 月 23 日去世，³⁵兩位耆老凋零後，原本以王姓家族為主要祀眾的節孝祠，可能因祀眾日漸減少而自然沒落，這也是家族血緣型祠廟凋敝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可能因素為官方推動圓山公園及圓山動物園、兒童遊園地的擴張，1930 年代因動物園、兒童遊園地的擴張需求而將已經凋敝的節孝祠拆毀，土地另做它用。自明治 30 年（1897）圓山公園設立後，官方在公園內陸續鋪設遊園道、興建休憩亭、植樹等，明治 32 年（1899）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在公園中設立「臺北縣警察官表忠碑」，總督府核准臺北廳設置之水野遵銅像於明治 36 年（1903）1 月 18 日落成，明治 39 年（1906）2 月 7 日節孝祠重建完竣後，大正 3 年（1914）年臺灣日日新報社獲准在公園內設計「筆塚」。

動物園的出現，使得圓山公園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大正 3 年（1914）4 月 5 日大江常四郎在圓山公園創設小型私人動物園，翌年（1915）5 月臺北廳為紀念大正天皇即位乃收購改為官營，重新整頓後的公設動物園於大正 5 年（1916）4 月 20 開幕，大正 10 年（1921）由臺北州移交給臺北市役所管理，定名「臺北市動物園」。至昭和 8 年（1933）臺灣總督府發包拆除曾充當總督府舊廳舍的欽差行臺，一部分建物遷至動物園內於 4 月 14 大致完工，昭和 9 年（1934）臺北市役所購入鄰近土地，設置附屬於動物園之「兒童遊園地」（兒童遊樂場），於 4 月 20 日正式開放。³⁶

惟考察文獻、報紙、期刊等，並未出現拆除圓山節孝祠的相關記載、報導或評論，節孝祠消失的時間仍不明確，推測被拆除的時間可能介於 1928 年 6 月至 1933 年之間，1945 年 6 月由美軍拍攝的空拍照片中，節孝祠原址已改建為一座近代建築物。1990 年曾有獅子會在此地興建紀念碑，現今僅存一組舊臺北市徽造型的低矮墩座。

³³ 1928/5/22 〈節孝祠春祭〉，《臺灣日日新報》，日刊，4版。

³⁴ 1921/2/25 〈老成凋謝〉，《臺灣日日新報》，日刊，5版。

³⁵ 1925/3/28 〈王慶忠氏仙逝〉，《臺灣日日新報》，日刊，4版。

³⁶ 引自「大事紀」，臺北市立動物園官方網站，2022/3/11，

https://www.zo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994C1D3233D329A&s=25A24345B0E9E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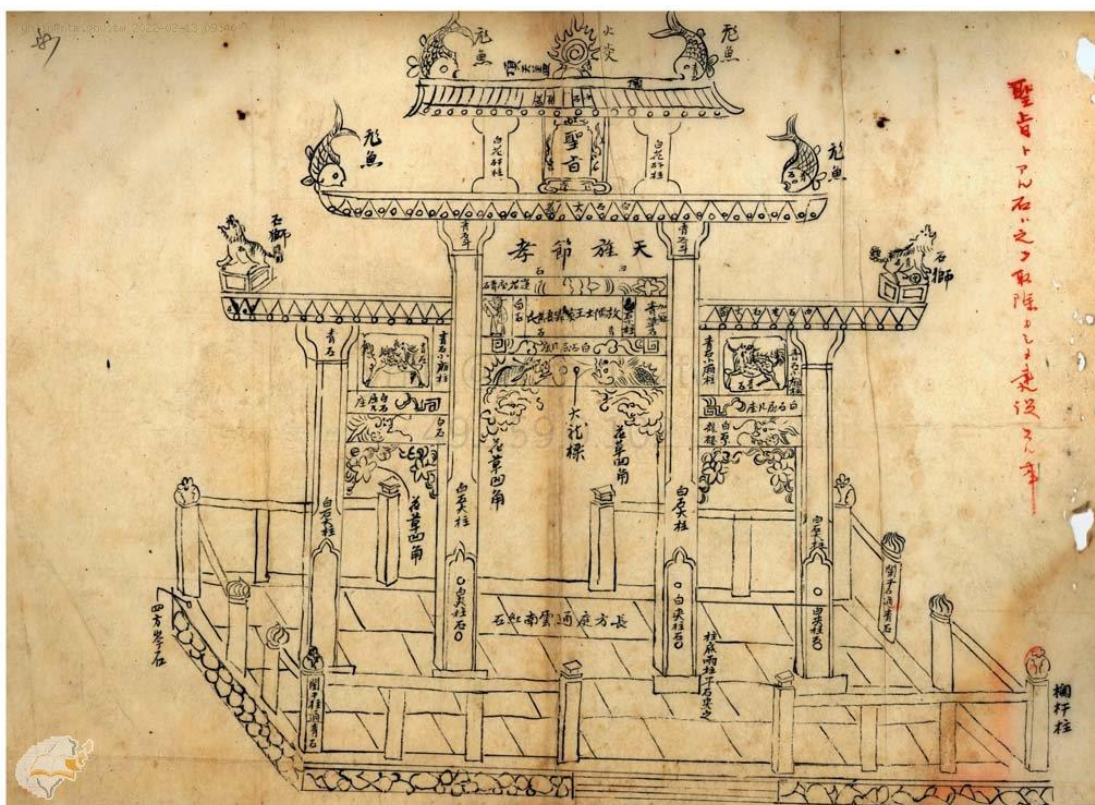


圖 7. 節孝坊原貌圖樣

來源：收於「節孝祠旌表再建之儀二付願書」，〈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甲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9035。

（四）節孝坊的重組與再拆遷

明治 39 年（1906）節孝祠已重建完成，而節孝坊之重組問題仍未定案，4 月 16 日王純卿再度向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請願，提交「節孝祠旌表再建之請願書」附上石坊的透視圖面【圖 7】，期望能將被拆除的節孝旌表遷建到 1900 年 8 月計畫、1906 年 8 月初成規模的新公園內，可供公眾觀覽，達成表彰人道義理的功效。³⁷臺北廳長佐藤友雄於同年（1906）4 月 19 日將此案轉呈給佐久間總督，經府議後由佐久間總督於 6 月 19 日裁決核准，3 點決議略以：1. 准許本節孝旌表在城內臺北公園中建設，2. 建設工程由土木局負責，3. 建設經費 450 圓以總督機密費支應。³⁸

從前述公文書內容，可確認節孝坊並非 1901 年重組，而是延遲到 1906 年才由總督府土木局以總督機密費支出 450 圓，在臺北公園內重新組立。然而檢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等史料，都沒有此牌坊重組之相關記載。明治 42 年

³⁷ 「節孝祠旌表再建願二付決定ノ件」（1906/4/16），〈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甲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9035。

³⁸ 「節孝旌表再建願ノ件」（1906/6/19），來源同註³⁷。

（1909）1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管内の旌表 府中街六丁目〉³⁹報導此牌坊係於明治34年（1901）年中準備移築至「公園預定地」，但1900年發布的臺北市區計畫中，新公園預定地只有南半部，北半部還不是公園預定地，該報導的說法乃是1909年的觀點，此時公園預定地已經在明治38年（1905）市區計畫⁴⁰中向北擴充為今日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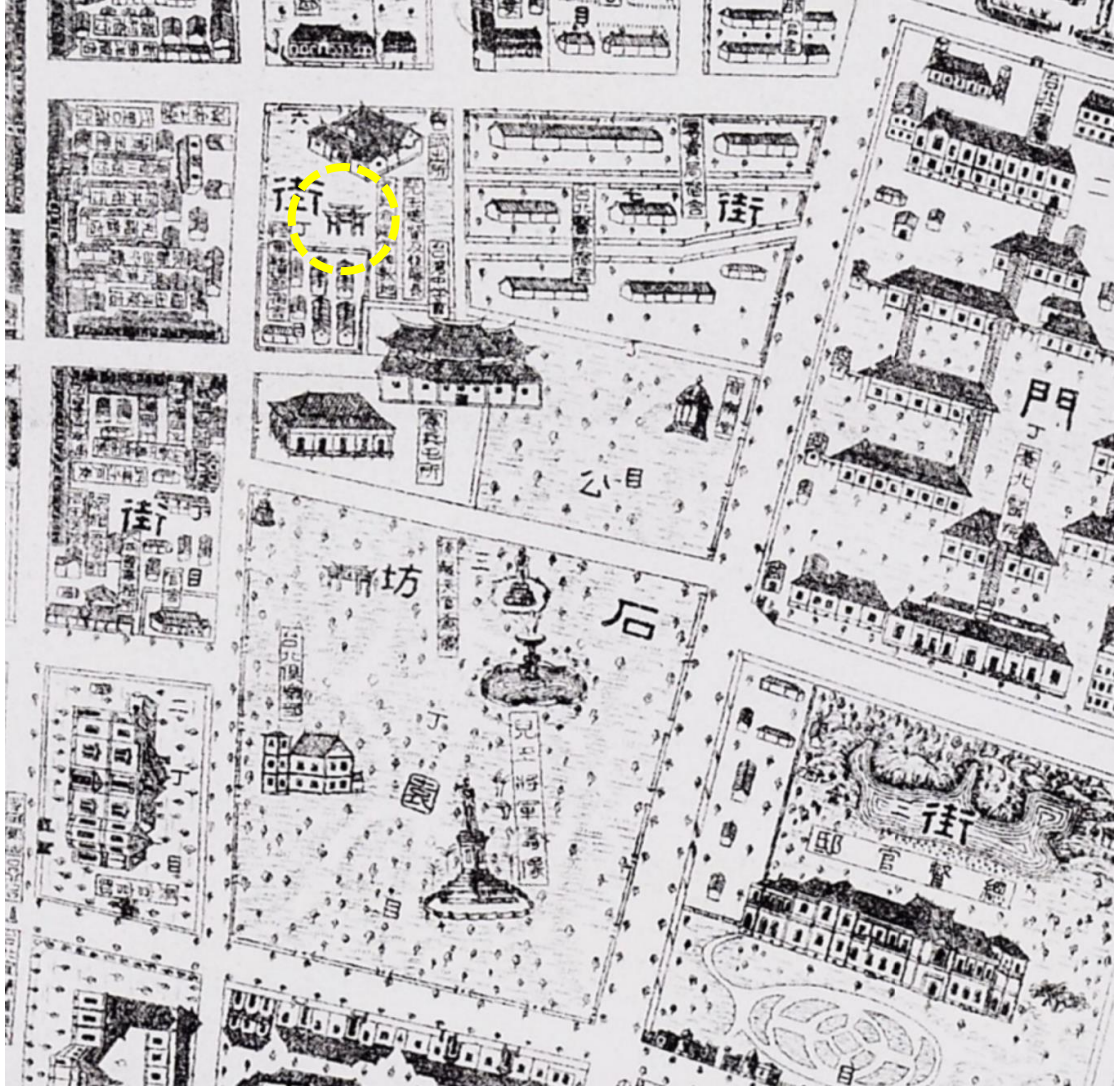


圖 8. 節孝坊移築至府中街六丁目之位置圖（1911年）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10 《飛行機スケッチ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局部。

然而，重組地點並非公園東北角。事實上在明治43年（1910）時，公園的北半部即今日常德街到衡陽路一線以北的區域，只能算是公園預定地，只有東側的鄰近臺北醫院（今日臺大醫院舊館）到天后宮的區域成為公園一部分，第一代音樂堂座落其上，其他區域仍是密密麻麻的建物群，包括東北角的專賣局官舍、臺北醫院官舍，中央的天后宮（充當臺灣中學校校舍及學生宿舍），西北角的蘇公祠、警察派出所、陸軍經理部官舍，

³⁹ 1909/1/1 〈管内の旌表 府中街六丁目〉，《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版。

⁴⁰ 明治38年（1905）10月7日臺北廳告示第199號發布臺北市區改正。

西南角的憲兵隊本部等。前述報導明確指出節孝坊移築到「府中街六丁目」即今日公園西北角，從明治 44 年（1911）出版《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圖 8】來看，確實有一座牌坊坐落在該處。

另依據加拿大 Whyte Museum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典藏之女性博物學家 Mary Schäffer Warren⁴¹攝影作品中，收錄一張拍攝於 1908 年以後、標題為「在建築物旁拉車工作中的男性」⁴²，經比對地圖後確認拍攝地點為臺北城內公園預定地旁，大約是今日懷寧街上接近襄陽路一帶，照片左邊的建物是面向西南西的蘇公祠，右邊即為移築後的節孝坊，石坊後方為惜字亭、更後方的兩排專賣局官舍屋頂清晰可辨。從照片可確認石坊為南北向配置，中間頂部大蓋上方仍為火焰，石坊四周欄杆仍存。此為節孝坊移築至新公園西北角的最明確證據，從相片中建物的相對位置，推定節孝坊第二次移動重組於座標 E25.043062/ N121.514368 處，大約在公園內懷寧襄陽路口的 3 號公廁正門前方。



圖 9. 黃氏節孝坊第二次移動重組後樣貌（1908 年以後）

來源：[Men working with wagons near building]. (ca. 1908 - 192-). Mary Schaffer fonds. V527/PS 1-990. Archives and Library, Whyte Museum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說明：原圖為幻燈片，左右反相。

⁴¹ Mary Schäffer Warren (1861–1939) 是美籍加拿大博物學家、插畫家、攝影家及作家，以二十世紀初期在加拿大落磯山脈的經歷而聞名，她曾於 1908 至 1909 年左右來臺，惟旅臺時間、行程及目的仍待查明。

⁴² [Men working with wagons near building]. (ca. 1908 - 192-). Mary Schaffer fonds. V527/PS 1-990. Archives and Library, Whyte Museum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明治 44 年（1911）8 月 29 日臺北廳長井村大吉向佐久間總督提出「官廟廢止之議稟申」，指出建於光緒 14 年（1888）的官廟天后宮，在 1895 年日本治臺後其祭祀已廢絕，其建物先後充當陸軍兵舍、臺北辨務署、學校、醫院、國語學校等，廟貌已老朽頹圯，擬予廢廟並將土地建物改編為國有，此案於 9 月 8 日經佐久間總督裁可。⁴³同年 9 月 2 日颱風來襲引發臺北大水災，天后宮建物嚴重受損、岌岌可危，臺北廳當局乃於同年 10 月發包辦理天后宮拆除工程、11 月 15 日起動工，⁴⁴以此為契機，才得以陸續將各建物拆遷、移築後淨空公園預定地。

然而促成公園預定地上諸建物得以拆遷、使公園向北擴張的理由，其實是「紀念營造物」（即後來的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的選址，明治 44 年（1911）5 月 8 日，建設會委員長內田嘉吉向臺北廳提出官有地使用申請書，擬無償借用石防街第 2、3 番地等 2 筆國庫土地為紀念營造物的地基。這兩筆土地即位於今二二八公園北半部，其中 2 番地是由臺北廳保管，當時已劃為公園預定地的一部分，但呈現草木叢生、髒亂不潔的狀態；3 番地則是由民政部保管，有陸軍經理部宿舍及其他建物坐落其上。⁴⁵此案經臺北廳轉呈總督府，後於同年 6 月 29 日經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以指令第 3777 號核准無償借用官有地。紀念博物館基地在天后宮北側，並未與天后宮重疊，因此指稱為了興建博物館而拆天后宮的說法並不正確。

為何 1906 年得以重組於公園西北側（府中街六丁目）的節孝坊，又被遷建到公園東北角（府中街七丁目）？何時遷建？為何再搬遷？最可能的理由為配合紀念博物館的新建工程而再度拆遷，新公園北半段自 1911 年 11 月起開始拆遷建物、整飭環境、空出土地以提供博物館及其週邊的水池、植栽草皮等庭園景觀使用，紀念博物館新建工程於（1913）大正 2 年 4 月 1 日開工，大正 3 年（1914）4 月 1 日舉行上棟式時，南側的日式水池、洋式噴泉池都已竣工，博物館建物於大正 4 年（1915）3 月 31 日⁴⁶竣工，4 月 18 日舉行落成式。

另比對大正 3 年（1914）《臺北市街圖》⁴⁷，確認新公園北半部出現了一條沿著今日公園路西側的平行綠帶與步道；大正 6 年（1917）⁴⁸為了在新公園內東北區建設前臺灣銀行頭取柳生一義銅像（即今日杏壇）時，建設專務委員長木村匡向臺北廳當局申請

⁴³ 「天后宮廢廟處分通達」（1911/9/1），〈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382020。

⁴⁴ 1911/10/7 〈天后宮落札と取毀〉，《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版。

⁴⁵ 「臺北公園使用許可申請認可（臺北廳）」（1913/4/1），〈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22001。

⁴⁶ 另據高石組編，〈工事概要〉，收於《紀念博物館寫真帖》所載，竣工日為3月25日，二者有差異。

⁴⁷ 新高堂書店編，1914/6 《臺北市街圖》，1/8,000。臺北：編者。

⁴⁸ 〈大正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卷地方〉（1917-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403。

使用官有地時所附的新公園配置圖【圖 10】，可確認此牌坊已移築在步道北端，呈南北向，位置大約在今日公園號捐血車旁、公園路人行道與公園內道路之間的綠帶上。

節孝坊於 1910 年代再移築後，座落於新公園東北角長達 70 餘年，其樣貌大致如田中大作於 1930 年代所拍攝的照片【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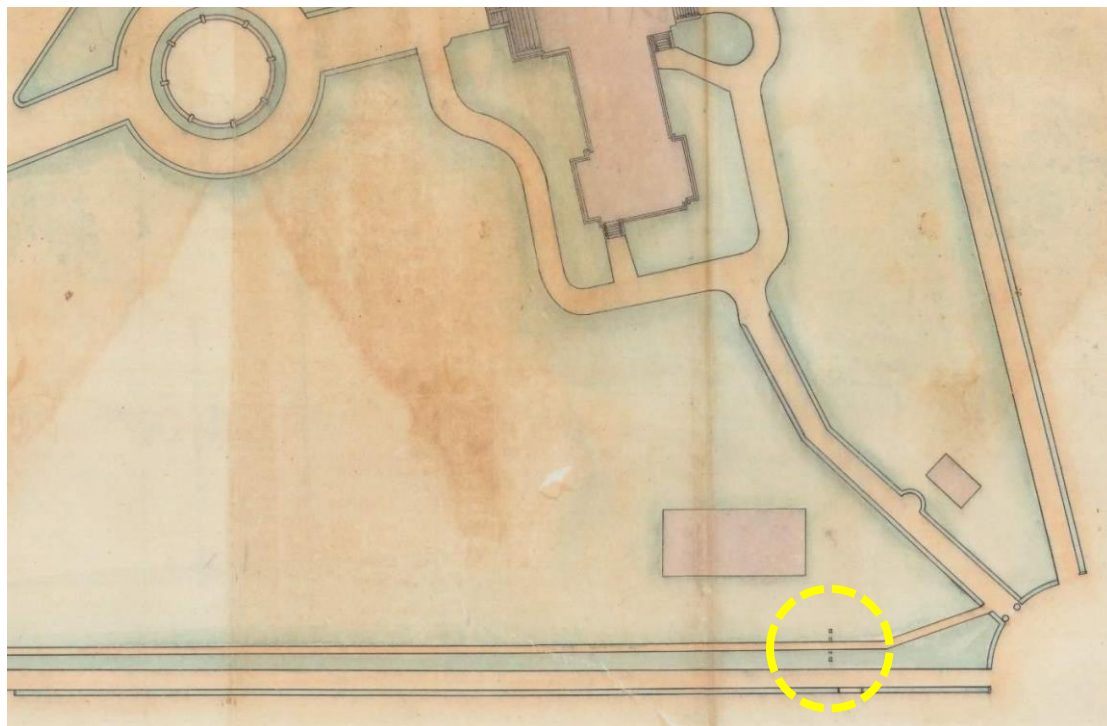


圖 10. 1917 年新公園配置圖內所見黃氏節孝坊位置圖

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號：000064030089003001M，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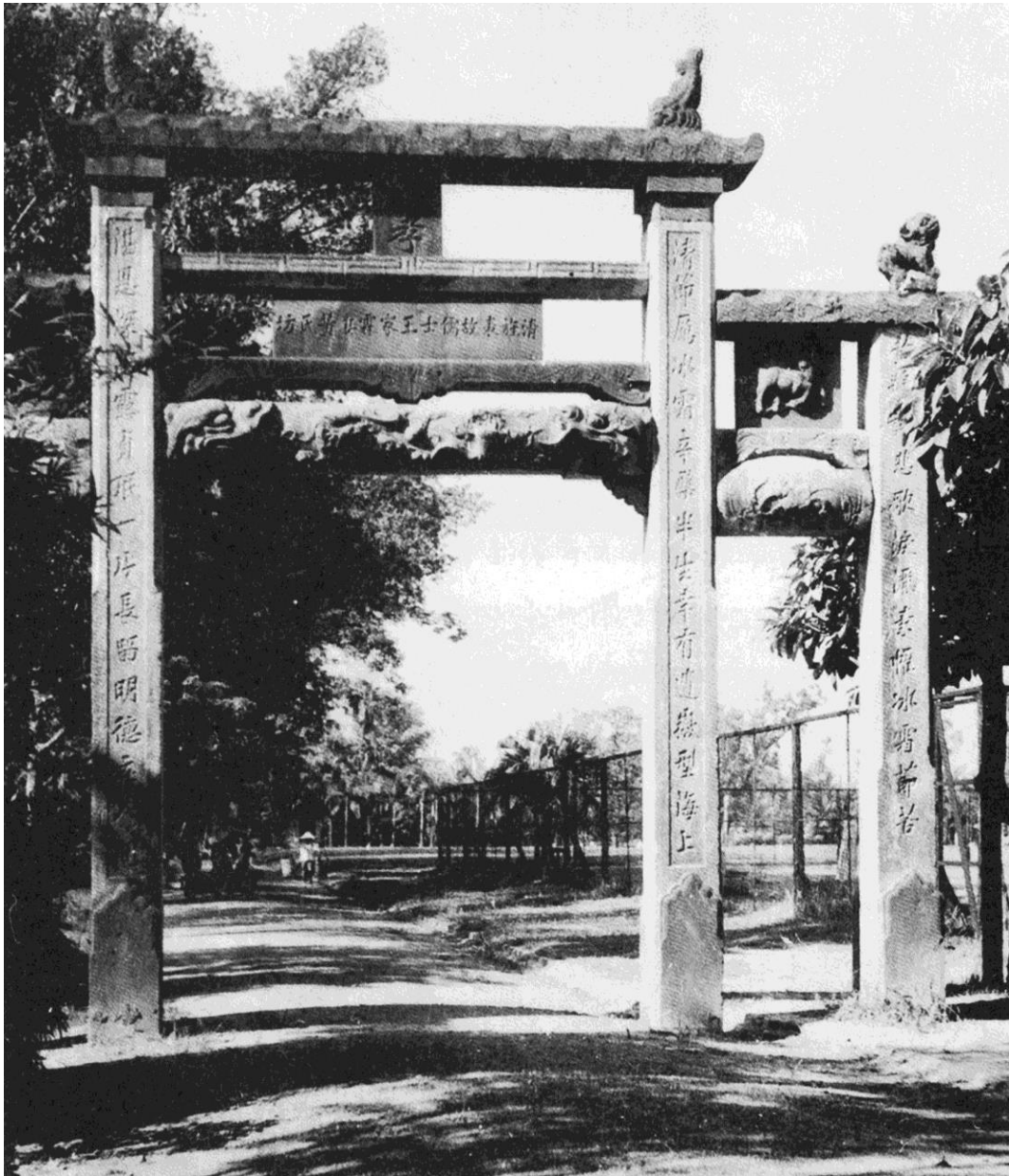


圖 11. 黃氏節孝坊第三次移動重組後樣貌（1930 年代）

來源：田中大作，2005[1950] 《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台灣島の建築に関する研究：台湾建築の全貌）》。
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三、黃氏節孝坊原貌與今日的差異

今日所見的黃氏節孝坊，因民國 79 年（1990）3 月捷運工程而第四度拆遷，由臺北市政府委託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拆遷與重組的規劃設計與監造，由福清營造公司施工，拆除後暫置於臺北孔廟後方料棚長達 7 年多，俟捷運工程完竣後復於民國 86 年（1997）10 月第五度移築回二二八公園，其過程與移築之工程細節已收錄於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

編纂的工作報告書。

1990 年第四度拆除前的節孝坊，詳如測繪圖面【圖 12】，與 1930 年代田中大作拍攝的照片【圖 11】相比，僅有大蓋兩端（兩邊大柱的頂部）一對石獅及中央龍樑下方左側之花草凹角等 3 件佚失，可知節孝坊第三度搬遷後座落於新公園東北角的 70 餘年間（1910 年代至 1990 年），其樣貌差異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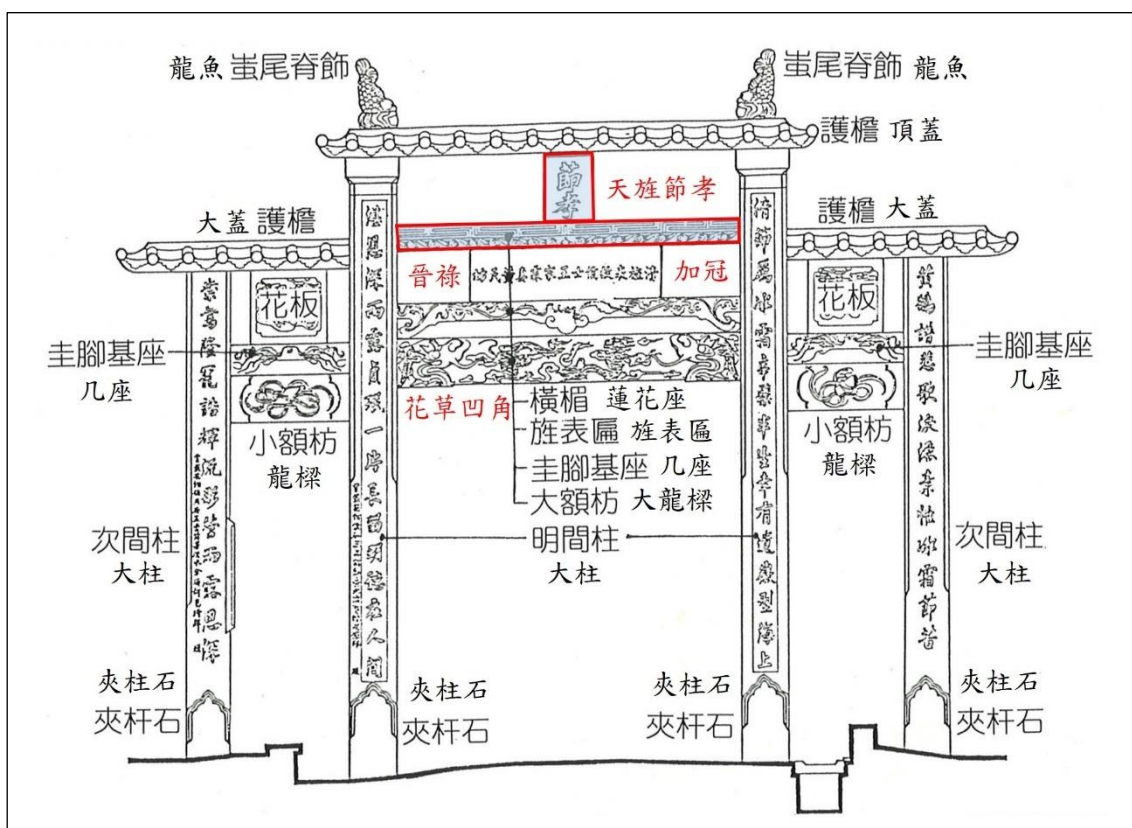


圖 12. 黃氏節孝坊第四次拆遷前北向立面實測圖

來源：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8，頁 16。

說明：圓體字為工作報告書所標註之各部位名稱，楷體字為筆者標註，引自 1906 年節孝坊原貌圖樣上標註之各部件名稱，可相互對照。

然而將 1990 年代的樣貌與 1906 年王純卿「請願書」所附節孝坊原貌圖面【圖 7】相比較，則有明顯的差異。依據原貌圖面，黃氏節孝坊之形制應與新竹市定古蹟楊氏節孝坊⁴⁹【圖 13】相近。黃氏節孝坊原貌形式為四柱三開間，頂蓋、大蓋由上而下、由窄漸寬，共有 3 層。頂蓋上方正中央設置火焰，兩端分置龍魚（鰲魚）一對。頂蓋下方正中央為聖旨石刻，聖旨兩側設杆柱一對，中段大蓋兩端分置龍魚一對，大蓋的中間（明間）安放「天旌節孝」橫匾，橫匾下方置蓮花座（橫樑），蓮花座下方置王府黃氏名諱之旌表匾，旌表匾兩側分別有小廟柱補間，左右分置加冠、晉祿 2 座石堵。

⁴⁹ 位於新竹市石坊街 4 號，創建於道光 4 年（1824），為旌表竹塹林熾妻楊氏居娘的節孝事蹟而立的牌坊，據稱為北臺灣最早的石坊。1985 年 8 月 19 日內政部以（七四）台內民字第 338095 號指定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2005 年改指定為新竹縣定古蹟。



圖 13. 新竹市定古蹟楊氏節孝坊舊貌（1985 年）

來源：黑白相紙，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典藏編號：CHSC11340002。

與 1906 年原圖比較，1908 年以後移築至新公園西北角的黃氏節孝坊【圖 9】本體已有 16 件零組件佚失，包括：聖旨、杆柱一對、中段大蓋、龍魚一對（中段大蓋兩端）、天旌節孝匾、加冠、小廟柱一對、晉祿、麒麟堵小廟柱一對（龍邊）、麒麟堵小廟柱一對（虎邊）、花草凹角（中間大龍梁下方右側）。

1930 年代的黃氏節孝坊本體累計已有 21 件零組件佚失，接續佚失的包括：火焰、花草凹角一對（龍邊龍梁下方）、花草凹角一對（虎邊龍梁下方），而四周欄杆也全部

佚失。

至 1990 年第四次拆除前，又佚失石獅一對（下段大蓋）、花草凹角（中間大龍梁下方左側）等，累計佚失 24 鍵零組件，其區位詳見【圖 14】的黃底紅框標示。零組件佚失的原因，包括 1901 年拆除時遭到福州籍苦力惡意破壞的「橫架」與「石座」，可能就是中段大蓋與天旌節孝匾等；另外在 1901 至 1906 年間以零組件散落於臺北廳前方時，若干細小零件可能遭竊、被另移他用或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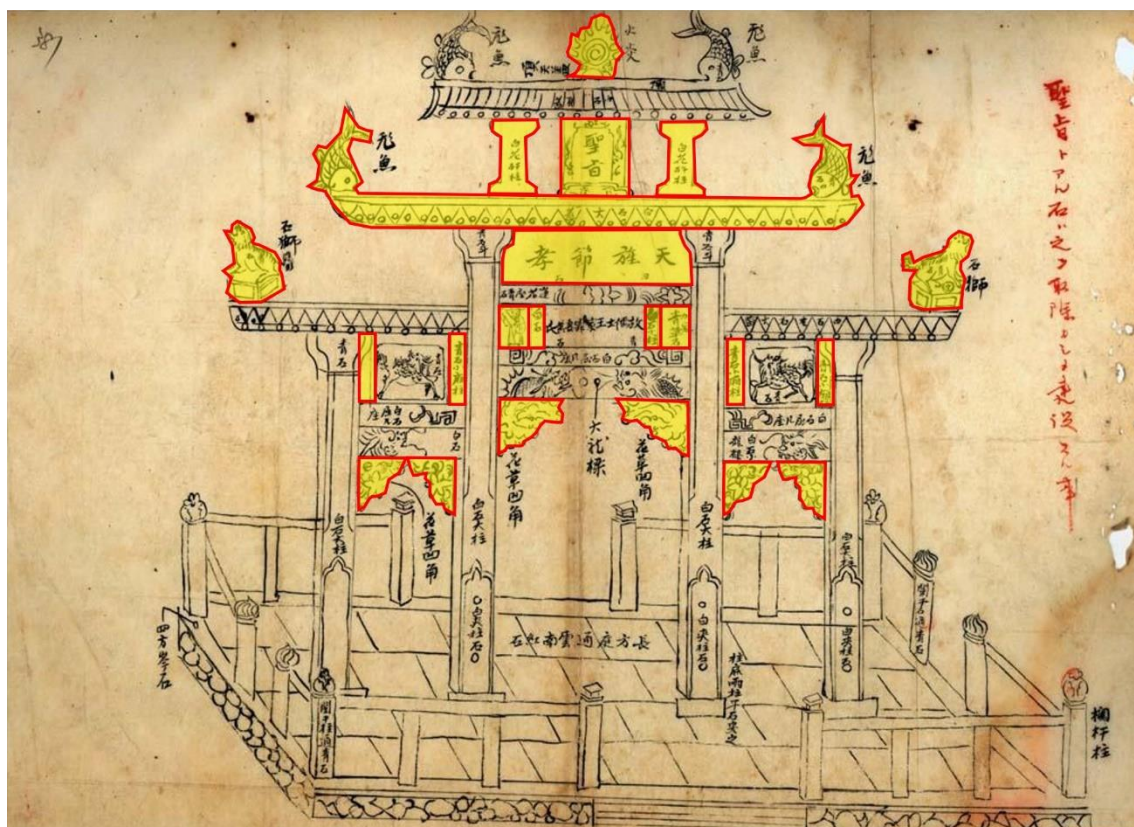


圖 14. 黃氏節孝坊已佚失的零組件位置圖

來源：底圖收於「節孝祠旌表再建之儀二付願書」。筆者繪製，2022。

說明：黃底紅框者，為石坊本體已佚失的零組件，四周欄杆於第三次移動重組至新公園東北角時全部佚失。

中間的「節孝」匾，與其下方的橫楣等 2 件，與原圖並不相同（詳見【圖 12】紫底紅框之標示），為 1906 年第二次搬遷並重組於新公園西北角（府中街六丁目）時所新作補接，並非 1882 年的原件。因零組件損壞及佚失，以致於在 1906 年第二次搬遷並重組時，必須調整造型，將三層大蓋的屋頂形式縮減為二層，總高度也因聖旨匾的佚失而降低了一層。

1997 年第五次搬遷並重組時，負責設計的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係依據第三次重組時的樣貌進行修復設計，著重於實證的掌握，⁵⁰改以色澤較淺的花崗石補作 17 件零組件，

⁵⁰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8，頁 8-9、50。

包括：葫蘆、石獅一對（下段大蓋）、麒麟堵小廟柱一對（龍邊）、麒麟堵小廟柱一對（虎邊）、花草凹角一對（中間）、花草凹角一對（龍邊）、花草凹角一對（虎邊），另外，但這些零組件的花樣，顯然於 1906 年原圖不盡相同，其中又以已佚失的頂端火焰被改為葫蘆；旌表匾兩側的加冠、晉祿 2 件石堵，分別被改為琴棋、書畫，以上 5 件差異最大。

2017 年 8 月 16 日清晨，臺北市公園處委外廠商在修剪公園樹枝作業時，作業車輛不慎擦撞黃氏節孝坊，造成中間右側的花草凹角（1997 年新作）掉落破損，經臺北市文化局會勘後，另行發包依 1997 年修復設計樣貌重作凹角 1 個，並於地面新作花崗石矮欄杆 4 組以阻擋車輛穿越。目前所見的黃氏節孝坊樣貌與各時期補作（仿製）的零組件位置，標示如【圖 15】。



圖 15. 黃氏節孝坊現況及仿製零組件分佈圖

來源：筆者攝，2022。

說明：紫底紫框者為 1906 年間補作；紅底紅框者為 1997 年補作；橘底黃框者為 2017 年補作及新作的零組件。

結 論

經由文獻考證與現場比對，本研究已釐清黃氏節孝坊拆遷過程中諸多混淆之處，以及各時期牌坊形貌的差異。已確認建於 1882 年的黃氏節孝坊自 1901 年因市區改正被拆除起，共歷經 3 次拆除、5 次移動、3 次重組：

- 一、第一次拆除後移動：因市區計畫劃為臺灣總督府秘書官官邸用地，於 1901 年 3 月經臺北縣當局發包拆除，零組件移至臺北縣廳舍前暫置，並未組立；
- 二、第二次移動後重組：1906 年 6 月以後經臺灣總督府支應費用，由總督府土木局負責，遷移到府中街六丁目，即今日二二八公園西北角；
- 三、第三次拆除後移動並重組：在 1911 年 11 月至 1914 年之間再拆解並移動到府中街七丁目即新公園東北角重組，經費來源仍待確認。再移築到新公園東北角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影響了紀念博物館的新建工程，或者是為了重新整理新公園北段的整體景觀，故而為之。與 1906 年原圖相比，前三次的拆除移動等共造成 24 件零組件損壞或佚失；
- 四、第四次拆除後移動：在 1990 年 3 月因臺北捷運淡水線台大醫院站工程，節孝坊再被拆解遷移到孔廟暫置，並未組立，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支應；
- 五、第五次移動後重組：1997 年 10 月 30 日再移到現址，新作 17 件零組件，並重組完成。2017 年 9 月補作凹角 1 件，並新作欄杆 4 組。

本研究也釐清了節孝祠之變遷過程，以及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的關聯。已確認是先建牌坊（1882）後建祠廟（1895），節孝祠尚未啟用即因臺灣割日後遭日軍徵用為倉庫，1900 年因市區計畫劃為臺灣總督府秘書官官邸用地，業主王家於 1901 年將土地捐出而拆除。在官方原則同意下，王家擬將節孝祠重建於臺北公園內，但遭地方政府臺北廳以公園狹小、氛圍迥異等理由不予認可，其次擬於艋舺八甲街民地重建，又因該地劃入市區計畫道路而不可行，終於在 1904 年獲得臺灣總督府許可並出借官有地，得以在圓山公園內重建，1906 年竣成安座，但直到 1930 年代該祠已消失，現場已難覓其殘跡。

在晚清臺北城建置的過程中，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是彰顯儒家思想之忠孝節義傳統道德的設施，代表清廷中央政府的政治教化作為，也直接反映了地方殷商的實力與名聲。日本殖民政府治臺後，以市區計畫為改造傳統漢人城牆都市空間的工具，劃定道路及官公署宿舍用地，石坊與祠廟因牴觸市區計畫而必須被拆除，然而日本官方並未將這些舊時代之教化信仰建造物完全毀棄，相對地中央與地方反覆詮議，企圖在城市機能與風俗教化上找到平衡點。

類比於拆除臺北城牆並改為三線道路、卻保留 4 座城門並視之紀念物的作法，官方原則同意這些彰顯節孝事蹟的石坊與祠廟得移入臺北城內公園預定地重新組建，這突顯

了公園在提供公眾休閒娛樂、在學術研究教育機能、在城市防災逃生收容等各種實用機能以外，兼具表彰「偉人」功績、或「忠孝義烈」等有教化世道人心的社會教化功能，即使是舊時代清朝天子下賜的旌表，於日本統治的新時代同樣具有統治教化之效果，符合殖民者之統治觀點與利益。

惟漢人傳統的祠廟風貌與近代公園的氛圍仍有迥異之處，在城內公園空間狹小的現實考量下，節孝祠必須被移到當時仍屬城郊的圓山公園。即使得以在城內公園預定地西北角重組的節孝坊，又須配合更重要、更具規模的近代政治教化設施：紀念博物館的新建及博物館週邊公園地環境整備的需求，而再次拆遷、重組於公園東北角。即使在公園東北角屹立了 70 餘年，幾乎已是新公園內代表性的設施之一，即使已指定為第三級古蹟，節孝坊在 1990 年代同樣必須配合重大交通建設而再一次拆遷重組。

黃氏節孝坊與節孝祠的拆遷重建過程與脈絡，闡明了在都市現代化過程中，如交通、衛生、土地使用分區管理等等空間設施之機能實用特性對上政治教化效益的輕重權衡，為文物、建造物等有形文化資產採取原址保存或易地保存的判準，一旦天平偏向都市機能的那一端，那些被官方認定具有政治教化特性、不宜毀棄的有形文化資產，即有可能被遷移到同樣具有政治教化機能的公園內易地安置保存，這也使得公園成為落難文物或建造物的收容場所。

徵引文獻

專書、論文

- 王惠君，2019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臺北：左岸文化
- 田中大作，2005[1950] 《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台灣島の建築に関する研究：台湾建築の全貌）》。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宋曉雯，2003 〈日治時期圓山公園與臺北公園之創建過程及其特徵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楊仁江計畫主持），1998 《臺北黃氏節孝坊組立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臺北：臺北市政府。
- 臺灣新民報社編，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編者。
- 蔡思薇，2006 〈日本時代臺北新公園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總督府檔案

- 「兵營其他ニ使用セル社寺廟宇取調」(1898/4/8)，〈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二卷戶籍人事社寺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1012。
- 「臺北城內旌表ヲ公園豫定地内へ移轉ノ件」(1900/8/24)，〈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戶籍人事社寺警察監獄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502006。
- 「臺北廳王純卿ヨリ秘書官官邸敷地獻納ノ件」(1901/12/20)，〈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二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5005。
- 「圓山公園地へ節孝祠移築及補助金下付ノ件」(1900/5/5)，〈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文書土地家屋社寺會計教育學術交通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33007。
- 「節孝祠旌表再建願ニ付決定ノ件」(1906/4/16)，〈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甲〉，《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9035。
- 「天后宮廢廟處分通達」(1911/9/1)，〈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382020。
- 「臺北公園使用許可申請認可(臺北廳)」(1913/4/1)，〈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22001。
- 「記念碑建設許可(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1/1)，〈大正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252002。
- 「銅像建設ノ為地方稅所屬地無料使用許可(木村匡)」(1917/1/1)，〈大正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403008。

地圖

- 不著撰人，1895 《臺灣臺北城之圖》，無比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 新高堂書店編，1914/6 《臺北市街圖》，1/8,000。臺北：編者。
- 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10 《飛行機スケッチ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無比例。臺北：

編者。

臺灣總督府製圖部，1895/12/13 《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1/4,000。臺北：編者。

資料庫、網頁

Whyte Museum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2022 ‘Research Collections’,

<https://archives.whyte.org/en>

Wen, 2007/8/18 〈黃氏節孝坊〉，《記憶·臺北》部落格，

<https://blog.xuite.net/liangcw/blog/12148910>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7 《國家文化資產網》，<https://nchdb.boch.gov.tw/>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限臺博館網域內使用），http://jjsb.ntm.gov.tw/login_rrxin.htm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8 《臺灣新聞智慧網》資料庫（限臺博館網域內使用），https://tnsw.ntm.gov.tw/login_newspaper.htm

臺北市立動物園，2022 《臺北市立動物園》網站，<https://www.zoo.gov.taipei/>